

新经典学者丛书

建阳刻书史

方彦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建阳 刻书史

方彦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阳刻书史/方彦寿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新经典学者丛书/黄 君主编) 2003. 4

ISBN7 - 80146 - 720 - 5/K. 120

I. 建… II. 方… III. 印刷 - 历史 - 研究 - 文集
IV. K. 127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7487 号

书 名	新经典学者丛书. 建阳刻书史
作 者	方彦寿
出 版	中国社会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英杰
印 刷	博立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 1000 册
书 号	ISBN7 - 801462 - 720 - 5/K. 120
定 价	38.00 元



作者简介

方彦寿，1952年11月出生，福州市人。长期从事建本研究和朱子理学研究。从八十年代起，在北京《文献》、中华书局《古籍整理与研究》、《福建论坛》、《福建学刊》、《出版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30多万字。已出版专著二部《武夷山冲佑观》，鹭江出版社1996年8月版。《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主编(与人合作)《闽北掌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副秘书长、建本研究会副会长、南平市政协委员。

序

闽建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前后达千年之久。而自宋代起，闽建则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在这个中心中，建阳则更为中心的中心。特别是建阳县西七十里的水南、麻沙、崇化、长平等地，书坊林立，比屋弦诵。尤其是麻沙、崇化两镇，书肆鳞次栉比，所刻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坟籍大备，且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甚至传诸高丽、日本。而供举子课读及场屋夹带用的讲章类书籍，更是百倍于经史。地处东南沿海，县地却又位居闽北山区的这么一个县，为什么会有如此发达的刻书业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脑际，总希望有位敏学之士撰书完成这个课题。现在这位学者出现了，专著亦行将出版了，真是大快人心事。专著，便是呈现读者面前的这部《建阳刻书史》，而此书的撰著者便是方彦寿同志。

我和方彦寿同志至今仍是神交。我知道他这个名字是八十年代初。那时我是北京图书馆《文献》季刊的编委，负责审读刻书史、版本学、目录学、书史等方面的稿子。有一次在审读的众多稿子中，忽遇一篇谈宋代建阳某家刻书的文稿，所用资料皆作者查阅该家宗谱、家谱所得，觉得资料可靠，考定可信，阐述有征，于是便想寻知作者概况。结果在作者寄稿时的前边附言中获悉，作者乃建阳人，在建阳县物资局工作，撰写刻书家及刻书史方面的文稿，完全是业余爱好。这时在我的思绪中便产生了两个闪念：一个是长期萦绕脑际的建阳刻书为什么那么发达的问题可能将来会由这个人解决，二是论他当时的文字水平，表述方式，文稿亦可不行刊用。这就面临着扼杀还是扶植的抉择。考虑再三，觉得退稿可能使刚刚萌芽的一颗学术幼苗完全覆灭；扶植可能使这个业余爱好的青

年燃起希望之火,从而改变人生航向,在学术上做出成绩。于是在审稿意见栏内签署了“文字润色后可以刊用”的意见。这大概是方彦寿同志在《文献》季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彦寿同志便不断有稿寄来,我也不断先读为快,《文献》也就不断刊用他的文章。八十年代中后期,方彦寿同志公出来京,造访《文献》编辑部,顺道来我的办公室看望,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谋面,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会晤。前不久,忽接彦寿同志来信,说是《建阳刻书史》已结集成书,即将出版,问序于我。我自知学问地位不宜弁言书首,只得回电推辞。彦寿同志很重感情,再三表示《文献》对他的培养,无论如何要我写几句附于书前。既然辞不获命,只好请他寄来大作的复印件,先行学习,后再评论。结果稿积盈尺,洋洋四十万言,只得粗读。读后有如下认识,行于笔端,供方家、读者参考。

一、这是全面系统阐述建阳地区古代刻书出版概况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不是单纯的刻书记录,而是在论及每一个时代时均将建阳刻书的状况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自然条件、地缘关系等具体背景下,加以科学的考析,从而寻找出其发生、发展、繁荣、昌盛的必然规律,使历史上的建阳刻书植根在建阳地区历史的沃土之上,再现建阳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光辉地位。我国历史上刻书发达的地区不止建阳,它如北京、开封、金陵、徽州、婺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成都、眉山、吉州、抚州、苏州、临汾等都有过辉煌的时期。有这部《建阳刻书史》开先河于前,深信其他地区的刻书史也会渐次问世,使我国出版史志的研究与编纂出现新的局面。

二、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的鸿儒硕彦,是著名的理学大家。他生于尤溪,成长立业于建安。以他为代表的闽学故乡就在这个地区。过去在谈论闽建刻书时,常常忽略朱子闽学与此地刻书之间的关系,《建阳刻书史》特别注意了这一点。它不但对朱熹私宅刻书的

时间、地点及版刻情况作了翔实的考证,对闽学人物及其讲学的书院在建阳刻书业中的影响,也做了有益的探讨。反过来,建阳刻书业的繁荣,对闽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较为新颖的是,宋代的版权意识和版权观念,在建阳刻书的管理中多有体现。而这种初始阶段的版权意念,朱子学派的人物于其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些,均是《建阳刻书史》独具的特色。

三、正如作者开始涉足建阳刻书时那样,不但注意吸取新的研究成果,也注意广泛检阅史籍,更利用自己长期生活、工作在建阳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掘史志、家乘、墓表、碑铭等方面的资料,使许多考证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许多人事,如宋代的俞成、叶棻,明代的董鏞、郭伟、张光启、张燮及叶氏三峰书舍、郑氏宗文堂等的考证,都是利用地方文献解决的。这就形成了本书的另一特色——占据第一手资料,别人不易比肩。

四、《建阳刻书史》在建阳编书、刻书、刻工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在插图版画的形式、结构、线描、刀法的探讨上,在官刻、私雕、坊刻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在建阳刻书、邻郡刻书乃至全国刻书的相互影响上;在建阳刻书兴盛与衰亡的走势演变中,作者都有翔实的论述,从而填补了建阳刻书研究中的许多空白。

总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著,我为它的梓行表示衷心的祝贺。为我国地区刻书研究树起了回日高标。

彦寿同志从一个黄牛垅上的插队知青,通过工、农、兵、学、商的种种磨练,最后跻身学林,成为朱熹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写出几十万字的颇有特色的专著,当是天赋、刻苦、坚韧、学识的结晶。深信此书问世之后,会有新作不断产生。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李致忠

牛年春节序于析津寓所

前言

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曾有过许多优美的传说,如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苍颉造字、周穆王藏异书于大小二酉山、众说纷纭的河图洛书,以及传说中神仙藏书的地方——琅嬛福地等等。

其中,琅嬛福地的传说与福建的藏书史和图书发展史有密切的关系。

相传晋人张华在未显之时,曾在建安郡(郡治所在今建瓯)担任过小官。有一次,他到野外游玩,途中遇到一人,邀他到一洞宫,石壁兀立之中忽有一道门,门内别有天地。但见宫室嵯峨,气派不凡。张华被引进一室中,室内陈书满架。此人介绍说:“这是历代的史书。”又带到另一室,说:“这是各国的志书。”这样,一室一室参观过去,每室都有奇书。其中有一室屋宇甚高,关闭得很严,且“有犬守之。(张)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张)华历观诸室书,皆汉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邱》、《杻杙》、《春秋》亦皆在焉。”张华看了非常高兴,对此人说,能否让他在此借住上一段时间,以便把这些书阅览一遍。“此人笑道:‘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此琅嬛福地也。’”

琅嬛福地由此成为后代藏书之家的代名词,清代苏州的藏书名家张燮的藏书处,即命名为“小琅嬛福地”;福建藏书家陈寿祺的藏书处命名“小琅嬛”;阮元有“琅嬛仙馆”,典均出于此。

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西晋大臣,文学家、藏书家,曾担任过中书令、散骑堂侍、中书监、司空等职,《晋书》有传。他博学多识,“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几篋。”有一次搬家,竟“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

是博物洽闻，世无与伦。”^① 由于藏书既多且精，以至秘书监在著录皇家的藏书时，也要借助张华的藏书来校正异同。

由于张华富于藏书，天下闻名。流传到后世，元代有个名叫伊世珍的，写了一部《琅嬛记》的书，卷首就记载了张华游历琅嬛福地的故事。这个故事，为闽中的藏书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表明地处建安的琅嬛福地可称为福建最早的“图书之府”。福建的藏书史，通常多以唐代闽县的林肃、五代侯官的林鼎、闽县的陈颢等人为闽中最早的藏书家，而这个故事，却将闽中的藏书史向前推进了近五、六百年。

伊世珍的《琅嬛记》一书，通常多认为所载荒诞不经，但此“琅嬛福地”的传说，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两晋末期，战乱频仍，一些藏书家为了避免藏书燬于战火，就带着自己的藏书南迁。如当时的藏书家刘正舆、傅颖根等人就曾把藏书运往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收藏，^② 而山洞，更是藏书的理想场所。因此，所谓“琅嬛福地”，就是当时这种现象的曲折反映。^③

琅嬛福地何处寻？图书之府觅行踪。

张华之后约八、九百年，福建刻书业崛起，传说中的“图书之府”在建安一带果真出现了，这便是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和清初，以刻书为世业的建阳书坊。

“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④，这是宋人祝穆笔下的描述。建阳学者熊克则将其称为“册府”。^⑤ “图书之府”或是“册府”，表达的都是建阳刻书业繁荣，刻本数量众多，巨幅奥帙、奇

① 《晋书·张华传》。

② 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76页。

③ 参拙文《闽北的“琅嬛福地”》，1997年2月7日《闽北日报》。

④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一。

⑤ 熊克《宴汪帅致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六。

书秘本充衍之意。建阳刻书业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其崛起的原因何在？其历史进程如何？有哪些特点？应如何评价其在中国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其衰败的原因又是什么？等等。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印刷书籍的国家。大约在东汉就发明了纸，在唐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萌芽于五代，兴盛于两宋的福建刻书业在我国的图书出版史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宋至明，福建的建阳一直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所刻印的书籍，在数量上始终居于全国之冠。

从宋代开始，建阳刻本就被许多藏书家所重视和收藏。从南宋的陈振孙、尤袤、赵希弁，明代的范钦、胡应麟、徐爌，到清代的钱曾、朱彝尊、黄丕烈、瞿镛、丁丙、陆心源、杨守敬、叶德辉、叶昌炽、李盛铎，以至近现代的张元济、傅增湘、郑振铎等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均无不收藏、研究建本。其中虽贬褒不一、毁誉参半，但从总体而言，对建阳刻本还是予以较高的评价。

与古代四川、浙江、南京、苏州、北京、徽州等地的刻书业相比，建阳刻书史上最具特色的历史现象有两个。一是历史悠久，书肆众多，许多刻书大族均子承父业，世代相沿，形成了著名的刻书世家。如余氏、刘氏、熊氏、陈氏，从宋代延至清初；叶氏、郑氏、詹氏则从元代延至明末。此外，还有黄氏、蔡氏、虞氏、魏氏均由宋至明。这种一家一姓世代相沿数百年，“世历三朝”的刻书专业户，在古今中外的印刷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刻本数量众多，内容广泛，举凡经、史、子、集、丛、靡所不备。清代福建学者陈寿祺说：“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

四部巨帙，自吾乡钺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①说的就是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刻本众多，销售面广。可以说，数百年来，建版书籍“嘉惠四方”，畅销全国，流传海外。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珍藏在国内外大图书馆，成为珍贵的中国古籍善本。其中有一部分已被北京、上海、台湾、日本等国内外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和利用。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古老的建本，也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现存的建本古籍中，举凡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小说戏曲史、经济史、医学史、民俗史、文献学史、图书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均可从中找到各自所需的珍贵史料。因此，古代建阳劳动人民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理应受到尊敬和赞扬。

由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偏见，视民间出版家为“书贾”之流，难登大雅之堂，方志载缺，正史更是不屑为之，故对今天的刻书史研究，造成很大困难。笔者才疏学浅，所以敢于提笔撰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生活、工作在建本的故乡二十多年。七十年代初，就在以生产“麻沙本”而闻名的地方插队多年，由懵懂而好奇，而兴趣，逐渐陷入课题之中，“走火入魔”而不能自拔。为撰写此书，笔者走访民间，稽查谱牒；泛舟书海，研究版本；拾掇晨昏，钩沉索隐。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制作资料卡片近万份，阅读有关著述及古籍近千种。曾在期刊上发表《建阳刘氏刻书考》、《建阳熊氏刻书述略》、《朱熹刻书事迹考》、《闽北刻书家生平考略》等一系列论文。

如本书能引起人们对福建文化史上刻书这一历史现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弘扬乡邦文化，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则吾愿足矣。

^①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八。

目 录

序.....	李致忠(1)
前言	
第一章 五代建阳刻书业的萌芽.....	(1)
第一节 建刻始于唐代说之不可靠.....	(1)
第二节 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	(6)
第二章 建阳刻书业繁荣于宋代的历史背景	(19)
第一节 经济的迅猛发展	(20)
第二节 文化事业的繁荣	(28)
第三节 闽学人物的影响	(32)
第四节 官私藏书的促进	(37)
第五节 人口增长的刺激	(44)
第六节 相对便利的交通	(49)
第三章 宋代建阳刻书业的繁荣	(53)
第一节 蔚为风气的官府刻书	(54)
第二节 双峰并峙的私家刻书	(62)
一、学者型私家刻书.....	(64)
1、朱熹及其门人刻书	(64)
2、其他学者刻书	(76)
二、家塾型私家刻书.....	(78)
第三节 方兴未艾的书坊刻书	(91)
第四节 邻府县刻书	(102)
一、邵武军刻书	(103)
二、南剑州刻书	(108)
第五节 宋代建本的刻工	(111)
第六节 宋代建本的编辑	(119)

第七节	宋代禁书对建阳刻书的影响	(133)
第八节	版权观念的形成	(141)
第九节	宋代建阳刻书的特点	(145)
第四章	元代建阳刻书业持续发展	(156)
第一节	寥若晨星的官府刻书	(159)
第二节	渐入低迷的私家刻书	(163)
第三节	众星拱月的书坊刻书	(167)
	一、著名刻书家及其刻本	(167)
	二、其他书坊刻书	(179)
第四节	邻府县刻书	(192)
第五节	元代建本的刻工	(194)
第六节	元代建本的编辑	(195)
第七节	元代建本的版画	(200)
第八节	元代建阳刻书的特点	(206)
第五章	明代建阳刻书业的鼎盛(上)	(212)
第一节	官方对刻书业的管理	(216)
第二节	追随时尚的府县官员——官府刻书	(220)
	一、建宁府刻书	(224)
	二、建阳县刻书	(227)
第三节	学者刻书与私家刻书的合流	
	——闽学诸子后裔的刻书	(233)
第四节	蓬勃发展并走向鼎盛——书坊刻书	(241)
	一、明前期建阳书坊的刻书家	(248)
	1、刘文寿翠岩精舍及其刻本	(249)
	2、刘氏日新堂及其刻本	(250)
	3、刘氏安正堂及其刻本	(252)
	4、刘弘毅慎独斋及其刻本	(256)
	5、叶景逵三峰书舍及其刻本	(260)
	6、杨氏清江书堂及其刻本	(263)

7、鳌峰熊宗立及其刻本	(265)
8、魏氏仁实书堂及其刻本	(268)
9、詹氏进德书堂及其刻本	(269)
10、明前期建阳的其他书坊	(270)
二、明后期建阳书坊的刻书家	(282)
1、书林余氏刻书	(283)
2、书林熊氏刻书	(300)
3、书林刘氏刻书	(313)
4、书林杨氏刻书	(326)
5、书林郑氏刻书	(334)
6、书林詹氏刻书	(343)
7、书林黄氏刻书	(348)
8、书林陈氏刻书	(350)
9、书林叶氏刻书	(355)
10、书林肖氏刻书	(359)
11、明后期建阳的其他书坊	(362)
第六章 明代建阳刻书业的鼎盛(下)	(368)
第五节 明代建阳的活字印刷	(368)
第六节 邻府县刻书	(370)
一、邵武府、县刻书	(370)
二、延平府、县刻书	(372)
三、邻县刻书	(376)
第七节 明代建本的刻工	(378)
第八节 明代建本的编辑	(397)
一、地方官员担任建本辑、校工作	(397)
二、当地学者担任建本编、校工作	(402)
三、外地学者被聘任为书坊编辑	(406)
四、书坊主人的自编自刻	(410)
第九节 明代建本的版画	(421)

第十节 明代建阳刻书的特点	(437)
第七章 清代建阳刻书业的衰亡	(448)
第一节 清代建阳刻书业衰亡的原因	(451)
第二节 清代建阳刻书概况	(462)
一、书院刻书	(463)
二、私家刻书	(464)
三、书坊刻书	(465)
第三节 邻府县刻书	(467)
一、邵武府刻书	(468)
二、延平府刻书	(471)
三、邻县刻书	(472)
第八章 建阳刻书的评价与贡献	(479)
第一节 前人对建本的评价	(479)
第二节 建阳刻书业的贡献	(489)
一、对以闽学为代表的闽北地方文化史发展的贡献	(490)
二、保存、继承和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的贡献	(497)
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506)
主要参考书目	(521)
从“黄牛垅”走向“书林门” ——代后记	(529)

第一章 五代建阳刻书业的萌芽

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始于何时？通常认为始于北宋，也有认为始于唐或五代的。北宋时期的建阳刻本，虽然由于年湮代远，今天保存下来的实物不多，但有前人书目或有关论述中著录的北宋建阳刻本作证，故建刻始于北宋的说法比较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我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五代说。

现作分述并考证如下。

第一节 建刻始于唐代说之不可靠

民国年间，胡群复先生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曾题写一幅长联，联中涉及建阳刻书的时间上限，认为始于晚唐。联曰：

昔晚唐建安余氏肇启书林，世界阅千余岁矣。其后三峰万卷，同时梅溪秀岩，文采风流。我思古人，聊从公等纂坊肆雅闻，缥緗掌故。

自北宋布衣毕升始为活板，变迁可一二数耶？近稽兰雪桂坡，上溯古经漆简，棣通演进。以有今日，何况此间称水陆形胜，东南管枢？

胡群复先生，人称“书联圣手”，研究对联的专家，并不研究刻书。他之所认为建安（阳）余氏刻书始于晚唐，有肇启书林之功，并非出于捕风捉影的臆测，而是有其来源的。其来源盖源于清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仪礼图》条下所载：

是本序后刻“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按宋版《列

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庵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徙建安书林习其业。二十五世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

彭氏此说，后又被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所转载，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如孙毓修就说：“独建安余氏创业于唐，历宋元明未替，为书林之最古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描写余氏是“唐宋元明朝市改，一家世业守雕剞”。叶德辉、叶昌炽、孙毓修的论著，在我国早期研究雕版印刷史中影响甚大，至今仍往往被学者所引用。

但据现有资料来看，建刻始于唐代的说法并不可靠。这一点，得先从乾隆年间对建阳余氏刻书历史的专门调查说起。

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的某一天，乾隆在阅读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迹印本时，看到纸幅上有“勤有”二字的标记；继而再阅读元代建阳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末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再读宋版《古列女传》，书末也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的刻书牌记。于是，他查阅了岳飞之孙岳珂写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一书，读到了其中评价《九经》刻本，以“建安余仁仲本为最善”之类的话。这下更激起乾隆强烈的好奇之心——

可见闽中余(氏刻)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时即以“勤有”名堂否？又他书载明季余氏建板犹盛行，是其世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书始自北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①

这些，他都想弄个明白。于是，他询问了“闽人之官于朝者”，却无人能知其详。他又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建的地方官——

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现在是否尚习刊书之

① 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八十一卷。